

再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以“侧重”识解操作为例

张 蕊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要 本文在张辉、江龙(2008)的基础上,探讨了该文发表后认知批评语言学的新发展。文章首先对批评话语分析在认知方面的不足进行了概括性分析,强调了将认知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文章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选取“侧重”识解操作,对其在话语策略的实施、话语目标的达成以及对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之间关系的阐释性作用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将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相融合,建立与发展认知批评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批评话语分析 识解操作 侧重 转喻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5)06-0034-08

DOI:10.13978/j.cnki.wyyj.2015.06.007

0. 引言

张辉、江龙(2008)认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CDA)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应用分析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一方面能进一步提高CDA研究的明晰性和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

随着CDA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运用于社会、政治等话语的分析,运用人脑的认知机制考察语言使用背后的内容,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CDA研究者和认知语言学家共同的关注点之一。国外语言学家对二者的结合已经有了尝试,其中以Hart(2010, 2011a, 2011b, 2011c, 2013)的系列研究为典型代表。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中的“识解操作”这一基本认知模式运用于话语的批评性分析中,探讨二者融合的途径,证明除张辉、江龙(2008)探讨过的隐喻之外,认知批评语言学对于社会话语中的其它话语现象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潜力

1.1 认知语言学简介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本世纪得到蓬勃的发展。同CDA相似,认知语言学并不是单一的语言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是基于一组有关语言的共同假设基础上的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其主要理论包括:概念隐喻理论(Lakoff & Johnson 1980)、框架语义学(Fillmore 1982)、动力意象图式(Talmy 1988a, 2000)、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 1994, 1997)以及认知语法(Langacker

1987, 1991)等。将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假设包括:人的语言能力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和人的认知能力紧密相关的;语言知识在本质上是概念性的,语法结构并非自给自足,它与意义的表达密切相关,意义根源于经验,语义不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人们在不同词汇、语法结构之间选择的结果。对语言的反客观主义观点和对经验主义的关注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特性,这一共性构成二者融合的基础。

1.2 针对CDA的批评——缺乏对认知因素的考量

CDA已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影响不断扩大,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针对CDA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对认知因素的认识不足便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CDA主张“广泛地运用各种语言理论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分析”(Weiss & Wodak 2003: 12),但事实上,CDA所采用的语言理论及研究目标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单就其所采用的语言理论本身而言(如系统功能语法),CDA也常常是有选择地使用。Widdowson(2004: 97)就曾指出,“CDA并不是对系统功能语法系统地整体地运用,而只是从方便的角度挑选符合自己研究目的的方面。”此外,一些CDA理论确实尝试将系统功能语法以外的语言理论运用于话语批评中,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折衷主义也受到诟病。Fowler(1996: 12)就曾指出,“随意地将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模型”运用于话语分析是危险的。CDA对多种语言理论的选择性运用缺乏系统性及连贯性。

另一方面,在Fairclough(1995)的话语分析三层次划分中,传统语言学对语言本身的描述性研

究做得最多 ;CDA 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关系做出了解释,但研究者们针对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之间关系的阐释性研究相对较少。用 Fowler(1996 :12)的话来说,“理论中没有考虑读者的视角”。O’Halloran(2003)也认为大部分 CDA 研究在语言认知方面存在不足。话语中的各种语言结构只有在话语消费者头脑中形成认知表征,才能使其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功能得以实现。

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CDA 的解释力明显不足,认知对等(cognitive equivalence)问题便是其一。话语在语言层面的表现与其在话语制造者、话语消费者^①的认知层面表征是否对等?对等程度如何?话语制造者与消费者所经历的认知过程是否相同?语言层面信息的缺失是否意味着话语层面乃至心理层面信息的缺失?(O’Halloran 2003)这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理论将认知因素加入话语批评的过程。但是,他考虑的仅仅是部分认知因素,并没有尝试对认知语言学理论本身加以运用(Hart 2010 :15)。迄今为止,将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地运用于 CDA 的尝试并不多(Chilton 2005 :21)。

1.3 认知语言学与 CDA 融合的潜力

认知语言学与 CDA 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语言的概念构造力方面,CDA 与认知语言学都持反客观主义的观点,二者都关注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的重要性。大多数 CDA 研究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认知过程在意识形态的表征与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Wodak 2006 :182)。Stubbs(1997 :106)也曾指出,如果想要将语言和思维结合起来,我们就需要与两者都相关的数据与理论。而认知语言学无疑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由于认知语言学是建立于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一组理论的综合,尝试从认知的角度对语言做出统

一的解释,因此在从传统概念上的语义到语法的广泛范畴内都拥有合理的解释力,如 CDA 研究中的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在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框架下都能得到解答(Koller & Davidson 2008)。隐喻研究只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若干关注点之一,也是人类语言使用所依赖的众多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的一种。将对认知识解操作的认识运用到 CDA 研究过程中,可以为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提供一个相对连贯且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弥补当前 CDA 运用语言理论零散、不连贯的缺憾。

2.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方式

在讨论了 CDA 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之后,我们以《人民日报》中的农民工新闻报道作为语料,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应用到批评话语分析中,以“侧重”这一识解操作为例,探讨 CDA 与认知语言学结合的可行方式。

2.1 认知识解操作

如 Langacker(1987)所言,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便是“语义即概念化”。表面上真值条件对等的事件/场景在同一种语言内可以形成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是负责概念化的“识解操作”作用的结果(Croft & Cruse 2004 :40)。针对同一事件/场景,概念建构系统会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结构表征(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说话者需要从中做出选择,对特定的场景进行概念化(Talmy 2000)。例如,汉语中的“母亲”与“妈妈”的真值条件是对等的,但二者概念化的过程有异,激活的语义框架也不尽相同。概念化的过程也就是识解操作的过程(Croft & Cruse 2004)。识解操作不仅存在于传统的词汇层面,更存在于语法、语篇等层面。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多种识解操作,并对其进行分类,其中以 Talmy (1988b) 和 Langacker (1987)的分类最为典型。Croft & Cruse(2004)对认知语言学家们提出的各种识解操作进行总结与分类,并将其同认知心理学家与现象学家们发现的心理过

表 1:识解操作与话语策略^②

话语策略 \ 认知过程		注意	比较	视角	完形
		识解操作	身份认同	焦点	
侧重					
扫描					
框架化			范畴化		
			隐喻		
定位				指示	
				模态	
结构构型					图式化

程进行对应,证实了这些识解操作的认知心理可行性,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认知语言学关于“人类的语言能力是普遍认知能力的一种”的假设。

Hart(2011a:269)指出,在话语的阐释阶段,CDA研究中提出的各种话语策略只有通过相应的识解操作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 Croft 和 Cruse 分类的基础上,Hart(ibid:272)对四种基本的话语策略与实现这些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进行了对应的分类与分析,见表1。

这一对应表为话语的认知批评分析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思路。基于普通认知心理过程的认知识解操作是话语策略得以实施的基础。只有借助特定的认知识解操作,激活听话人对于话语的定向阐释,话语策略才能起作用,话语目的才能达成,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传播。受篇幅所限,下面我们仅以表1中的“侧重”这一识解操作为例,证明其在话语的批评分析中的解释力。

2.2 “侧重”识解操作与话语的批评分析

Langacker(1987)用基体(base)和侧重(profile)两个概念来解释词义范畴与认知背景之间的关系。基体就是背景,侧重就是以基体为映衬被凸显的部分,即词义范畴本身是侧重,与词义范畴存在直接关系的知识或概念结构是映衬词义概念的基体。侧重与背景的关系,不只适用于语义的解释,更适用于话语分析的各个层面。在侧重的案例中,注意力辖域中不被侧重的部分是隐含的。转喻、名词化和无施动者的被动结构都是侧重这一识解操作作用的结果。

转喻是一种典型的侧重/背景关系。Lakoff 和 Turner(1989)认为,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的概念映现,这一映现包括的“替代”关系主要是指称。Croft(1993)利用域凸显来阐释概念转喻。他在同一认知域矩阵中考察转喻的认知本质,认为概念转喻是次认知域和主认知域之间的凸显关系。Langacker(1999:199)指出,转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参照点现象。更准确地讲,通常用转喻表达的实体作为参照点为目标实体(即实际所指的实体)提供心理通道。

Kövecses 和 Radden(1998)指出,转喻是一个概念转移的认知过程。Croft 和 Cruse(2004)依据转喻背后的语义关系将其分为“本征性”(intrinsic)和“非本征性”(extrinsic)两种。非本征性关系指的是偶发性、随机性的关系:如餐厅里的客人与其点的菜;而本征性关系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或者至少是较为固定的联系:如某人和某人自身的各种特征之间的关系。在 CDA 研究中,已有尝试对不同类型的转喻在话语中(多见于移民话语研究)的意识形态作用进行

研究。Reisigl 和 Wodak(2001)指出,非本征性转喻可以使施事关系神秘化,而本征性转喻则具有两种功能:凸显个体的某种特征(通常是负面的)和构建并传播某种社会原型。部分句法层面上的名词化现象中,转喻也起着重要作用。Hart(2011c)、张辉、张天伟(2012)对认知转喻在 CDA 中的作用也曾进行过分类与介绍。

(1)非本征性转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非本征性转喻通常涉及从施事者到其他相关实体的概念转移,例如,施事工具代指实施者,产品代指实施者等。Langacker(2002:215)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行为链上的侧重/背景问题。在原型语句结构中,句子的主语由施事者(agent)充当,施事者自然而然地被概念化为行为链的首要参与者与“能量源”(energy source),因此也具有最高的显著度,是句子中最被侧重的部分。随着能量的传导,句子各部分的显著度及被侧重的程度也逐渐削减,如例[1]。

[1]各级政府一方面强化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就业有门路,求职有信息;一方面部署开展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落实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人民日报》2010.1.22)

例[1]是典型的施事的显性结构。“主语位置的默认题元是施事,及经验者、致使者等施事类题元”(刘丹青 2005:292),因此施事在句子的主语位置获得语言表征,是概念层面的行为链在话语表层表征的原型结构。在该句中,“各级政府”在针对农民工的各种行为的行为链上被赋予积极主动的力的施加者的角色,承担着推动话语表征行为前进与实现的作用,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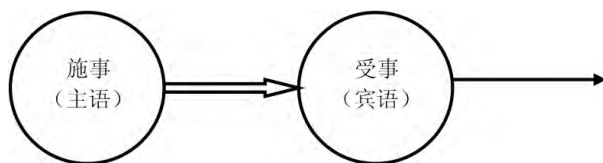


图1:显性施事行为链

在真实话语中,出于不同的话语目的,话语制造者常常对上述原型行为链和行为的原型语言表征进行变形,对行为链的各个参与者如施事、受事、工具等进行相应的安置,为行为链的各个参与者赋予不同的显著度,从而引导话语消费者就同一客观内容进行截然不同的阐释。如,使施事通过不同于施事者本身的事物或者是依靠主语以外的其它语言结构获得表征,甚至以缺省的形式出现并且需要依靠话语消费者基于语境和语用原则的推理才能够还原,我

们将这些结构统称为施事的隐性结构。在这些结构中,施事在整个行为链中作为发力者的核心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与话语所述行为的关联度也随之改变。对于施事显著程度的弱化,是最典型的借助非本征性转喻实施的话语制造手段,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也值得探讨。

当一个施事同时与两种行为发生联系时,新闻报道中常会出现对其中一个行为进行名词化语言表征的现象。这类语言现象依据其内部的语义关系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在第一类中,两种行为是平行关系,施事实体同时在这两种行为中承担动作发出者的角色(如例[2]);在第二类中,两种行为存在递进关系,施事实体仅是被名词化的动作一的发出者,而动作一的实施或者结果作为第二个施事实体,在第二种行为中担任动作发出者的角色(如例[3])。在这两类名词化结构中,随着动作一本身的名词化,动作一的施事在行为链中作为力的施发者的显著地位发生了变化,其显著度发生明显的下降,而这一“凸显与背景化”的机制正好可以为话语制造者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所用。

[2]比如各地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新举措,应充分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本着问计于民的原则,事先和群众进行实事求是的沟通,让群众意志成为改革的主要精神。(《人民日报》2010.1.21)

在该例中,从句子的表层结构看来,划线部分是“考虑”这一行为的主语,是行为的发出者;从深层的语义关系理解,“各地政府”才是“推行”和“考虑”两个行为的施事,做出“考虑”动作的应该是“政府”甚至是“政府”所代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不是“措施”本身。这句话的前两个分句的行为链如图2所示。第一行为“推行”在句中以名词性主语的形式出现,在概念层面上,这实际上是一个“行动代参与者(ACTION FOR PARTICIPANT)”(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276-277)的转喻。但是,“推行”行为的发出者“政府”在语言表层结构上又没有完全被隐去,它以名词定语

的形式呈现于语言表层,因此我们在图示中用浅色框和箭头分别对这一施事及其施加的力加以表示。同时,由于“政府”与“诉求”之间的施事与受事的关系在语言表层没有得到显性的表征,我们用虚线箭头表示二者之间力的作用。

话语消费者在对此类结构进行阐释时,注意力会更更多地集中于“推行新举措”这一行为本身,而非新举措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比起施事的显性结构,这种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意识对于“政府”等职能部门行政行为的“自上而下”强制性的认定,更有利于调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话语受众对该行为的支持与参与,激发社会各阶层的责任感,使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目标行为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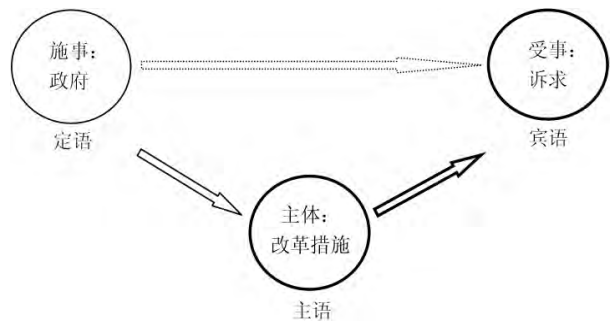


图2:施事的隐性结构:主体行为的名词化1

[3]实施就业服务政策向农村劳动力的延伸,使城乡劳动者享受平等的就业服务。(《人民日报》2010.1.20)

同为主体行为的名词化,例[3]中第二行为(使城乡劳动者享受平等的就业服务)的施事者不再与第一行为(实施就业服务政策向农村劳动力延伸)是同一实体,而变成了第一行为本身或者是结果——但是由于第一行为的施事者对第一行为的实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连续性力的传导。在例[3]中,“实施”行为的施事者在语言表层没有得到表征,需要话语消费者结合认知语境在概念层面自发地填充,因此在图3中我们用虚线框加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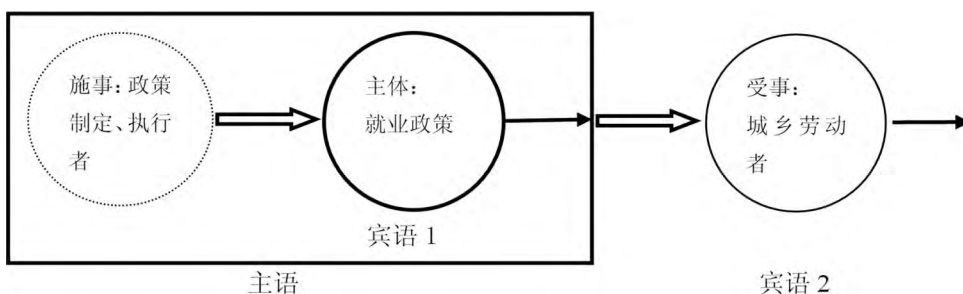


图3:施事的隐性结构:主体行为的名词化2

在上图中,粗体框和箭头是话语中凸显的成分,浅色框为获得语言结构表征、但显著程度相对较弱的成分,而虚线框则表示在话语中没有获得语言表征、但是在话语消费者的头脑中根据完形的认知原则和行为链内部的非本征性临近关系能够获得补充的成分。正如 Reisiigl & Wodak (2001: 58)所指出的,“转喻将责任行为人保持在语义背景中”。针对中国农民工新闻报道话语案例统计分析显示,被名词化的行为的施事、责任人或者说潜在的责任人中,以政府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和推行者为主。借助行为链上其它临近元素提供的心理通道,这些施事在话语消费者的头脑中能够获得还原——但是相比于典型结构中,它们的凸显程度被大大降低了。

除主体行为的名词化以外,中国农民工媒体话语中常见的施事的隐性结构还包括施事的物化、施事的非显性可还原结构、施事的完全缺失等语言结构。这些结构都借助非本征性转喻实现对相关内容的侧重与背景化。虽然施事是话语背后行为链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核心,它在话语中却经常以隐性的形式存在。

不可否认,此类结构的使用部分是基于汉语语言习惯。但是,施事的隐性结构在农民工媒体话语中高频出现,也具有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动因:对施事者显著程度的弱化,可以在概念层面拉远行为主体与行为本身等行为链上其它元素的距离,从而实现行为责任关系的模糊化。以农民工话语为例,这些结构的选用能够在话语消费者的概念层面弱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农民工等人群的接纳度设定等传统意义上多为单向的政府行政行为与行为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于是,这些行为不再被看作单纯的政府施力、群众受力的单向力的作用,这更有利于社会合力的凝聚,有利于更和谐、公平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系。这种对于政府等施事凸显程度的弱化,正是主流媒体在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助力中国梦”的大形势下,在话语层面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2)本征性转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Hart(2011c: 178)指出,本征性转喻涉及的仍是侧重操作,但是不涉及行为链。本征性转喻侧重的通常是给定认知域中的一个成分,或者是包含了所有成分的整个认知域本身。由此,Hart进一步将本征性关系细分为“内向型”(inwards)与“外向型”(outwards)两种。“内向型转喻”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以小代大”,最常见的就是“某一特征指代实体本身”的转喻。通过这种转喻,相对于实体本身,实体的某项或某些特征获得凸显,其它特征在某种程度上

被掩盖。如中国农民工媒体话语中,针对农民工所使用的“农民”系列名词性称名指称,就是典型的借助内向型本征性转喻实现对目标实体农民工进行身份认定的目的。

[4]张晓山认为,目前在很多地方,农民工进城打工、购买商品已不受限制,但是在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因此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根本是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人民日报》2010.1.7)

当“农民”“农村劳动力”“农业转移人口”等指称在新闻报道中被用来指称农民工群体或个人时,基于“农民”的概念域中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就随之获得了凸显,而同一认知域中的其它元素也相应地被背景化了。其概念域中组成元素的变化如图4。

上述“农民”等汉语语言单位在无语境、无指称等话语作用的情况下,对概念域中各种概念要素的唤起潜能是均等的,但当其在特定话语语境中作为农民工的指称时,该概念域与“农民工”概念域所共有的要素(如出身农村、具有农业户口等)便获取了相对更高地唤起潜能,成为了语义激活点,为话语消费者搭建起一条(或几条)通往所指称概念域的心理通道。话语消费者在话语语境中对该指称的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心理上靠近指称目标即农民工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两个语义网络连接点的共有语义要素便成为了话语消费者注意的焦点,而这两个认知域中并不紧密相关(如图4中“农民”的人格优势和缺陷等,在图中用实线框标示)甚至相悖(如从事生产的性质等,在图中用虚线框标示)的语义要素则由于远离这条心理通道而淡出话语阐释者的心理视野。这种借助目标认知域中某一或某些固有属性搭建起通往目标认知域的心理通道的机制,正是“内向型”本征性转喻的作用机制。于是,在对与“农民”出身及相关意义语素的指称的阐释过程中,话语消费者对农民工群体的“农村出身”和“户籍身份”等社会属性的注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得到了强化,而这些被凸显的属性又强化了被指称的农民工与新闻报道话语消费者(主要以城市居民为主)截然二分的范畴特性。

针对农民工的“农民”系列指称的产生与使用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但是,这种指称方式在媒体话语中的频繁使用,在话语受众中可能导致的社会群体的分划效果也许是主流媒体一直没有注意到的。这种借助内向型转喻实现的对于目标实体某些特征的凸显,进而产生的范畴化效果,也只有从认知的视角、剖析话语受众对话语的阐释过程才能够发现。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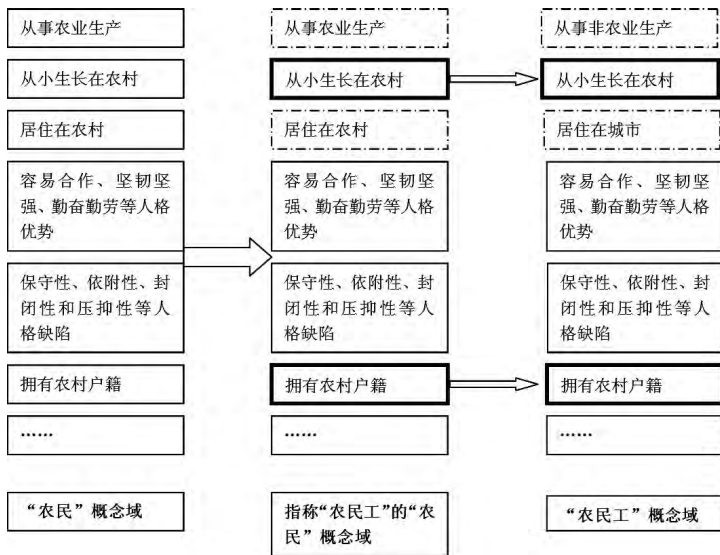


图 4：“农民”指称方式转喻作用图

是将认知语言学融入话语的批评研究的意义所在。

“外向型转喻”最典型的代表是“群体指代个体”。Reisigl & Wodak(2001)曾指出,这类转喻通过对不同个体的无差别对待,在不同等级之间创造相似性与同质性,达到创造与凸显某种社会范畴原型的目的。中国农民工话语中,针对农民工的“工人”系列指称便是基于“外向型转喻”的指称方式。

官方对“工人”这一概念界定的标准先后经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户籍身份”——“生产资料所有制”三个阶段。虽然在经济学领域,“不占有生产资料”一直是“工人”的典型特征,但在社会学领域,“工人”是城市居民的典型代表。主流媒体话语中,用“工人”指称农民工的案例逐年增多。除“工人”一词外,“产业工人”“职工”“员工”等近义词也在新闻报道中作为农民工的指称出现。职工、员工等概念存在着交叉关系,二者常常可以相互替换。而“工人”则是职工、员工的下义范畴,农民工作为“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又是“工人”的下义范畴,于是“工人”系列指称与指称对象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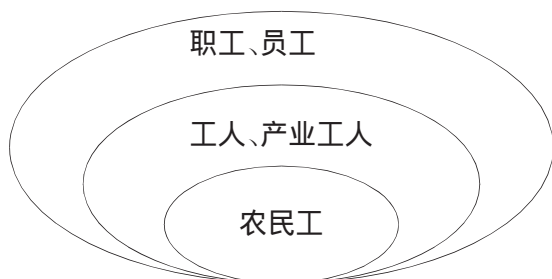


图 5：“工人”系列指称方式关系图

农民工在“职工”“员工”和“工人”范畴中并非典型成员,作为这些概念的指称对象原本凸显度不够高。因此,借助“工人”等上义范畴概念对“农民工”这一相对的下义范畴概念进行激活,实现从这些上义概念到农民工的转喻,必须经过适宜的语境调控,使农民工这一非典型范畴成员的显著度提高,甚至超越该上义范畴的典型成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农民工设置为话语的中心话题,从而将“农民工”概念设置在上义范畴激活的认知框架的中心位置,使其获得足够的显著度,为话语消费者在心理上从该上义范畴指称走向“农民工”概念提供足够的趋动力。如在例[5]中,除报道的“农民工”主题这一语篇语境外,“返厂”等单句语境也是辅助“工人”“员工”等指称激活“农民工”认知框架的重要因素。

例[5]乔连海介绍说,为了吸引工人,还对春节后进厂的员工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比如报销员工返厂路费,为夫妻提供单独宿舍,宿舍安装柜式空调,成品单价比往年调高。(《人民日报》2010.2.22)

用“工人”等一系列概念对农民工进行指称,实际上是将参照点向更大的范畴转移的外向型本征性转喻。这种上下义范畴之间的本征性关系属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一种,但是又并非是基于真实世界的构成性的组配关系(partonymy),而是基于种类关系的范畴性的心理分类或再分类(taxonomy)。这种分类关系虽然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具有空间、时间等维度的邻近性,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存在概念上的邻近性。由于范畴化是人类运用语言对世界、客观、实体、存在本身进行的分类,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是人类主观上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的基本方式,针对某一或某些概念的范畴化,经过多次重复共现,会在人类的头脑中固化下来,构成主观概念上的邻近性,这种分类性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特定文化中一旦固定下来,就不易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因此具有本征性的特征。

在话语语境与指称方式的共同作用下,话语消费者对“工人”系列指称做出“农民工”意义的阐释,可以实现多种话语效果:一方面农民工作为这些指称概念范畴的典型成员逐渐为话语消费者所接受——新闻报道的受众逐渐接受原本被视为农民阶级的农民工群体被纳入到传统的具有城市特点的“工人”群体中的分类与事实,这有利于缩小农民工与传统城市“工人”之间的福利、待遇等差距,也有利于农民工

城市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另外,农民工作为“工人”的典型成员借助转喻性指称被凸显,其各种特征也会相应地被新闻报道的受众阐释为整个“工人”群体的特征。今日的农民工已不再是过去生产技术、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社会下层群体,新时代的农民工有文化、有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生产、服务领域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作为话语消费者的我们要在时代的大环境中理解话语,看到变化,接受变化,积极思变。

综上,基于选择性心理过程的“侧重”识解操作在话语中身份认同策略的实施及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结论

识解操作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人们语言处理过程中潜在的心理过程与心理资源,也是各种话语策略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从认知的视角研究话语阐释过程中识解操作的作用,有利于更透彻地理解话语制造者如何借助对语言表层结构的操纵,促使听话人产生定向性识解,达成特定的话语策略,从而使听话人接受、乃至自发地产生与话语制造者相同的立场与态度。媒体话语的制造者更需要考虑听话人的认知因素与阐释过程,以避免由于话语使用不当引起的识解变异,导致话语受众对于话语权阶层真实意图的误读。受篇幅所限,笔者仅以“侧重”这一种识解操作为例,证明了其在话语策略的实施以及话语制造者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表明,认知语言学的识解操作理论对揭示隐喻以外的话语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同样有效。

建立于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理论基础上的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理论层面,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一个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综合系统,它可以弥补批评话语分析“语言理论单一和缺乏系统性”的不足。作为一种以人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理论,它可以对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有力的阐释。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引入对认知因素的考量,还能之前一些在CDA中没有获得解答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在实践层面,二者的结合亦能拓宽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将社会因素纳入其考察范围,使其更具实用价值。认知批评语言学能够指导话语制造者,特别是媒体,从听话人的话语阐释过程着眼,关注话语在听话人概念层面内化的过程,更忠实、准确地向受众传播话语权阶层的真实意图,避免由话语

制造与话语阐释之间的间离引起的误读。

注释:

- ① 由于影响话语消费者对话语的识解过程的因素纷繁复杂,这里我们不考虑话语消费者个人的特质性因素。这里的话语消费者指的是理想的听话人(idealized discourse consumers)。
- ② Hart的这一版本的对应表建立于Hart(2011a)中提出的对应表的基础上,有部分改动。

参考文献:

- 刘丹青. 2005. 赋元实词与语法化[C]//吴福祥. 汉语语法化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92-322.
- 张辉,江龙. 2008.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J]. 外语学刊(5):12-19.
- 张辉,张天伟. 2012. 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喻视角研究[J]. 外国语文(3):41-46.
- Chilton, P. 2005.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 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C]//R. Wodak & P. Chilton. *A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Method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52.
- Croft, W.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4): 335-370.
- Croft, W. & D.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C]//Linguistics Society of Korea.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11-137.
- Fowler, R. 1996. On critical linguistics[C]//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Text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3-14.
- Hart, C.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M]. Basingstoke: Palgrave.
- Hart, C. 2011a. Force-interactive patter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J]. *Discourse & Society* 22 (3): 269-286.
- Hart, C. 2011b. Legitimising assertions and the logico-rhetorical module: evidence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in media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J]. *Discourse Studies* 13 (6): 751-769.
- Hart, C. 2011c. Moving beyond metaphor i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C]//C. Hart.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1-192.
- Hart, C. 2013. Event-construal in press reports of violence in political protests: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2 (3): 400-423.
- Koller, V. & P. Davidson. 2008. Social exclusion as conceptual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a cross-genr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making[J]. *Discourse & Society* 19 (3): 307-331.

